

主编 赵鹏飞 鄢志耀



探索与奋斗

——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足迹

中国文史出版社

探索与奋斗

——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足迹

主 编 赵鹏飞 鄢志耀
副主编 张 明 张国镛
王学范 桂柏松

中国文史出版社

顾问：王钦民 肖根黎 刘开明

作者：（按姓氏笔划排列）

王学范 龙光尧 叶 萍 刘洪彪

罗华江 罗国干 张 明 张国镛

林桂红 陆 韵 赵鹏飞 桂柏松

高志前 郭国成 鄢志耀

探索与奋斗

——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足迹

主编：赵鹏飞 鄢志耀

*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房县印刷厂印刷

*

1990年12月第一版·1990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2 字数：310 千字

印数：1—3500册

ISBN7—5034—0244—X/D·14

定价：6.50元

目 录

引 言 从“士”说起.....	(1)
第一章 近代的轨迹.....	(8)
一 开眼看世界.....	(8)
二 天国英雄的幻想.....	(12)
三 近代科学的奠基.....	(15)
四 举起维新的大旗.....	(19)
五 辛亥革命的原动力.....	(28)
六 几种救国思潮.....	(39)
小 结 (一).....	(45)
第二章 改造社会的探索.....	(49)
一 启封建之蒙.....	(49)
二 对“强盗世界”的再认识.....	(55)
三 百家竞起觅出路.....	(61)
四 分化.....	(68)
五 走十月革命的路.....	(72)
六 新文化成就.....	(80)
第三章 投身国民革命.....	(84)
一 争取主权的斗争.....	(85)
二 国民会议运动的先锋.....	(91)
三 活跃在工农运动中.....	(97)

四	投笔从戎	(106)
第四章	艰难的探索	(113)
一	走上复兴中国革命的道路	(113)
二	国民党政权的智囊谋臣	(122)
三	另辟蹊径	(127)
四	文化战线上的斗争	(136)
五	社会性质大论战	(142)
六	民族危亡中的觉醒和奋起	(149)
第五章	在抗战中	(160)
一	走向抗日救亡的大道	(160)
二	为日伪鼓噪的汉奸文人	(169)
三	拥蒋抗日的希望与失望	(174)
四	在共产党的怀抱里成长	(183)
五	文化运动的发展	(192)
六	为抗战胜利而斗争	(198)
第六章	迎解放	(207)
一	争民主反内战	(207)
二	中间道路的破产	(216)
三	战斗在第二条战线中	(226)
四	“自由主义运动”	(234)
五	革命文化的成就	(239)
六	走向光明	(244)
小 结 (二)		(250)
第七章	踏上新征途	(255)

一	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	(255)
二	变革与初步发展.....	(259)
三	文坛三公案.....	(266)
四	里程碑.....	(274)
五	向科学进军.....	(280)
第八章	艰苦创业.....	(285)
一	错位.....	(285)
二	“脱帽加冕”.....	(292)
三	攀登科技高峰.....	(297)
四	文教事业新发展.....	(302)
五	受挫.....	(308)
第九章	在十年动乱中.....	(313)
一	悲剧的开端.....	(313)
二	悲剧的发展.....	(319)
三	接受“再教育”.....	(322)
四	冬天里的春风.....	(326)
五	逆境.....	(333)
六	困境中的贡献.....	(340)
第十章	在徘徊中前进.....	(346)
一	初春.....	(346)
二	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351)
第十一章	振奋精神 开拓前进.....	(358)
一	角色的恢复.....	(358)
二	振兴教育.....	(364)

三 托举起富强的太阳.....	(371)
四 昌盛文化事业.....	(381)
五 走向世界.....	(390)
小 结 (三)	(395)
后 记	(401)

引 言

从“士”说起

士，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特殊阶层。辞书上解释为读书人，意即今称的知识分子。这里泛指古代介于大夫和庶民之间不从事农工、商业活动，而专门进行学习或传授文化知识，并依附于统治阶级的阶层。士，产生很早，应该说自国家的产生、阶级的出现就出现了，但鉴于中国历史文字记载的缺陷，一般都只从春秋战国时期说起。

春秋战国是中国社会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急剧转化的时期，全面的社会大变革为有知识的阶层提供了充分施展才能的时代条件。群雄割据和竞争霸权的现状，使大多数统治者能够保持较为清醒的头脑和实行容纳人才的政策，帮助自己运筹帷幄，以巩固自己的霸权地位。于是，视贤下士成为社会风尚。在时代的要求下，那些出身于平民而身有才学的人得到了充分的表演机会而空前活跃起来，一个新兴的士阶层崛起了。从此以后，士逐渐成为统治阶级中知识分子的通称。

春秋战国时期的士人不仅人数多，队伍庞大，而且涉猎领域广泛，在社会生活中举足轻重，影响深远。他们积极研究社会政治、军事、经济等问题，企图用自己的学说影响诸侯。同时，士大夫（这里指还没有做官的读书人。下同）的广博学识和斗争策略也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于是各类有不同专长的人才得到了充分表演的机会。在他们中间，涌现出为数众多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如管仲、子产、商鞅、孙武、吴起、孙臆、鲍叔牙、蔺相如等等。他们一个个才华横溢，建树

卓著，灿然夺目于时人和后人面前。在学术文化方面，他们以横空出世的气概，敢于自成一格，创新立意，从而形成百家争鸣局面，带来了中国古代学术的空前繁荣。中国古代文化各个流派的学术渊源大都发端于该时期，而各个流派的开山鼻祖或大师，也都堪称这个时代士林中的佼佼者，如儒家的孔丘、孟轲、道家的李聃、墨家的墨翟、法家的韩非、兵家的孙臆、名家的公孙龙、农家的许行、杂家的吕不韦等。各种学派都可以著书立说，广收门徒，高谈阔论，互相驳难，学术界极其活跃，学士因之得以享受较大程度的学术自由。文学艺术方面，以屈原、宋玉的作品为代表的楚辞，为我国古典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至今仍然当之无愧地屹立于世界文学名著之流。孟轲、庄周、荀况、韩非和其他诸子的散文，大量吸收民间语言，思想开阔，语言丰富，文辞多采，议论风生，为文学体裁和形式的多样化树立了良好的先例。他们的文章也各具浓郁的风格特色，孟轲的议论语言犀利，善于辩论，庄周的文章汪洋恣肆，想象丰富，荀况的文章气势磅礴，说理透彻，韩非的文章峻峭尖刻，锋芒毕露。封建士大夫阶层，朝气蓬勃，充满活力，为推动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这种时代背景，形成了我国封建士大夫的早期性格：重视学术争鸣和学术的社会功能，重视人世的现实变革和政治利益，主体意识十分强烈，不仅诸学派的领袖人物如此，这个阶层的一般成员也往往如此。但是，诸子学说大都脱离当时的社会实际，少有直接为社会服务的，他们为解决社会问题开出的方略，如孔丘“克己爱人”、“复辟周礼”的主张，墨翟“非攻兼爱”的主张，庄周“清静无为”、“小国寡民”的主张，都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只有兵家和韩非的“礼治”和“法制”学说才比较切合实际，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此外，由于各诸侯国的主要精力是应付战争与外交，因而诸子对经济、科技、商业等没有予以充分重

视。根据对春秋战国著名人物进行的粗略统计，政治、军事人才占各类人才总数的大半，在众多的人才中，关心和从事科学、农业、水利等事业的不过有墨子、李冰、甘德、石申等几个人，他们的学说较多涉及自然科学知识。

秦汉帝国的建立，确立了封建大一统局面。封建士大夫的命运随之发生转变。战国末期，诸子各派学说已经出现了互相吸收和融合的趋势，以《吕氏春秋》为其代表的杂家，以阴阳五行学说作为自己的理论框架，吸收和揉合了儒家、法家、道家等各派学说，把“孝悌”与“忠君”密切结合起来，发展了儒家的宗法观念，并提出统一文化的要求。到了汉代，董仲舒以“天人感应”理论，把儒家学说改造成为树立绝对君权，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强有力工具。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取得了独尊地位，并通过各种行政手段加以推行，从而在事实上完成了封建文化的大一统。封建士大夫的知识结构和文化心理由此发生了变化，他们的学问以儒家经典为来源，以注释经学为内容，整个士大夫阶层日渐经学化、儒生化了。

大一统的局面，为士大夫从事历史学的研究创造了条件。汉代史学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块丰碑，“史学泰斗”司马迁的巨著《史记》、班固的《汉书》，确立了封建史学的理论体系和基本原则。特别是《史记》，全书体系完整，疏而不漏，“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创造了纪传体的形式，成为一部不朽的著作。历代的史学家、文学家几乎没有一个不从《史记》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在文学方面，司马相如、杨雄等人的汉赋，亦不时闪烁出耀眼夺目的光彩。贾谊、晁错的政论文，言辞急切，声情并茂，论证有力而富于色彩。科学在两汉也有发展，《汉书》对当时的天象记录是相当丰富的。具有多方面科学成就的巨人张衡创造了浑天仪和候风地动仪。《周髀算经》是我国现存的最早数学著作。此外，农学、医学也在士大夫的重视和研究中有了相当

的发展。但总的来说，随着百家争鸣、学术自由时代的结束，封建士大夫的创新精神随之枯竭，在富丽堂皇的文字雕饰后面，是思想内容的日益贫乏和形式的刻板僵化，士大夫开始失去了昔日的风采和活力。经学政治化的结果，使经学变得繁琐和神秘，日益荒诞迷信，更多的士人则皓首穷经，愈来愈变得空疏无用。

魏晋南北朝，封建大一统遭到破坏，士大夫不能不对汉王朝的覆灭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建立在宗法家族制基础上的小农经济和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其统治思想仍然只能是儒家文化。盛极一时的魏晋玄学正是这一时期士大夫用道家思想改造儒家文化的结果。他们用道家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使儒家思想进一步哲理化。与此同时，士大夫还喊出了要求思想自由的微弱心声，他们的个性有所抬头。嵇康的疏狂耿介，阮籍的清高不群，实质上都潜藏着对传统和世俗偏见的反抗。在佛教的传播与反传播斗争中，士大夫的理论思考能力得到进一步锻炼。南北朝时期，中华民族开始了又一次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过程，在北方少数民族吸取中原文化和开发南方文化的历史过程中，士大夫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他们不仅在政治舞台上各显神通，而且是中原文化与各少数民族文化交流并融为一体的纽带。士大夫阶层的规模和社会作用在这一时期显著地扩大了。然而，这个阶层同封建政权的结合在此却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障碍。两汉时期，封建统治者实行荐举制，由各级官吏举荐有德行或有才学的儒生，从而给儒生打开利禄之门。但随着统治阶级内部的腐败和士大夫队伍素质的不断下降，门阀豪族地主势力极度膨胀，统治阶级以九品中正制取代了荐举制，士人按门第高下分为九等，“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庶族”。豪门贵族把持一切大权，士大夫阶层被人为地排斥在统治集团之外，因而与这个阶层的发展状况产生了尖锐冲突，激起了士大夫的强烈不满。

隋唐朝，封建大一统再度成为现实。雄心勃勃的隋文帝一登

被，就着手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关系，明令废除九品中正制，采取科举制择优取士，争取广大士林拥护。至唐太宗时代，科举制进一步完善，其特点是取消对士子门第资格的限制，以考试质量为准。科举制的确立，使封建士大夫阶层纳入了封建官僚体制的运行轨迹之中，成为封建官僚的主要成员和可靠后备军，这既给官僚政治增加了活力，也使得封建知识分子完全投入地主阶级怀抱。唐太宗见到登科的新进士，大喜曰：“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有唐一代，从科举制中选拔出来的人才不计其数，各色风流人物应有尽有，可谓天下归心。如果说战国时代的苏秦、张仪还能在列国自由地各投其主，魏晋的“狂士”还与封建政权有一定距离的话，那么隋唐的科举制则象一张无形的大网，最大限度地把士大夫吸引到做官求仕的道路上去，就连李白这样的孤标傲世人物，也曾一度对科举道路发生兴趣。“十年寒窗苦，成名天下知”，何况还有与之俱来的荣华富贵，即使考到白发苍苍，还是孜孜以求、乐此不倦。科举制找到了地主阶级与士大夫结合的最好形式，这既标志着统治阶级政策的成熟，也标志着封建士大夫的成熟。灿烂辉煌的唐代文化，凝聚着封建知识分子的心血和创造。唐朝是中国封建士大夫精力最旺盛，成绩最卓越的鼎盛时期。

唐代以后，士大夫开始自觉地为封建地主阶级服务。五代十国的割据状态，没有引起士大夫对封建大一统的质疑，相反，他们以把儒家学说进一步封建纲常化为己任，以便更深入地占据人们的精神境界，牢固地维系封建伦理关系，为封建统治奠定千年不变之基石。其间涌现出周敦颐、张载、程颢、朱熹等理学大师，他们代表各自不同的学派，在论争中使儒家学说进一步思辨化、伦理化，以此为统治阶级服务。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非常自觉地体现了这种阶级意识。《资治通鉴》无疑是一部具有很高史料价值的宏著，但在学术理论上并没有多少突破，史学研究十分明确地同封建政治的现实利益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但由于经济

的繁荣，特别是城市经济的发展，给文化事业的繁荣创造了便利条件。五代两宋及元明的文学运动水平有所提高，发展不断深入。五代两宋的词、散文，元曲，明朝的章回小说，高潮迭起，真豪辈出。科学的新成就突出地表现在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三大发明的完成和发展上。然而，随着封建社会进入晚期，统治阶级的政策日趋保守昏庸，封建士大夫逐渐丧失了早期性格中的进取精神。他们中的有识之士和杰出人物往往同现实社会发生冲突，而自己本身又陷入封建正统思想不能自拔，只得清官自守，甚或杀身成仁，尽忠以报君王。如王安石、岳飞、李纲等就是如此。

从明代开始，科举制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必须以八股取士，考试内容只能出自四书五经，文体只准用八股。同时规定士子不得议论时政，在这种文化政策和人才政策引导下，科举不能再激发士大夫的社会抱负，八股只是个晋升之阶的敲门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士大夫的努力下，明代在文化科学技术方面仍然取得新的发展。传奇小说达到很高的艺术成就，并产生了大量的以历史、公案、言情、神怪为题材的章回小说，如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吴承恩的《西游记》，堪称士代巨著。这个朝代也产生了李时珍、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等优秀的文学家、科学家，他们在医药学、农学、地理学等方面取得卓越的成就。

清王朝继承明制，发展了八股科举制度。在清代科场，统治者用种种手段，侮辱士子人格，摧残他们的身心健康，而许多人心甘情愿，至死不知悔悟，正如龚自珍所说的那样，是一株株被扭曲的“病梅”。他们深深感到封建社会行将就木，同时也哀叹自己的有才无能。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士林的控制，封建统治者大造“文字狱”，其借口之荒唐、手段之暴戾，骇人听闻。有的罪名是私修明史，指斥朝政；有的是妄议朝政，诽谤皇帝；有的是著述文字，冒犯圣讳，这些人都会银锁入狱，轻者“重谴”。

“革职”，重者“弃市”、“立斩”。雍正朝，翰林院庶吉士徐骏一时粗心，将“陛下”写成了“狴下”，即被革职，查抄其诗集，诗中有“清风不识字，何得乱翻书”的句子，又被“正法”。象这样的“文字狱”在清朝有过几百次。残酷的高压政策迫使封建知识分子不敢思考问题，议论朝政，研究经世致用的学问，不敢探求国家社会兴盛的道路，只好去搞训诂、考据，钻研古纸堆一套，走通过八股考试追求仕途的道路。知识分子同社会实践、生产实践相脱离的作风在清代尤甚。学术方向的偏差以及士大夫的精神风貌使我国学术无可挽回地丧失了他曾经占有的世界领先地位。士大夫的聪明才智已为封建制度所禁锢，这个阶层已失去了昔日的光彩，丧失了自己的风骨，它的精英人物同社会格格不入，平庸之辈以至卑劣小人反倒平步青云，飞扬跋扈。正直清廉的郑板桥一生坎坷，才高八斗的曹雪芹潦倒终身。买官纳妾、草菅人命的理学名臣李光地却不可一世。封建士大夫道德的沦丧，说明社会的腐败已到了极点。

清王朝已经走上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垂死阶段，面对接踵而至的社会危机，在专制主义压制的逆境中奋争而起的龚自珍在苦闷中向苍天呼喊：“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长夜难明，黑幕如铁，龚自珍的呼喊是微弱的，但黑暗到了极点将有尽头，这是历史的辩证法。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社会矛盾的激化，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将会带着自身利益的要求和救国救民的主张，步入中国的历史舞台。

第一章 近代的轨迹

19世纪中叶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远涉重洋，驶来舰队，架起大炮，对准东方尚未被卷入世界市场的封建古国猛轰，1840年，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终于轰开了中华帝国闭关的大门，战争的结果是清政府被迫签订了屈辱的《南京条约》，从而开了四千年文明史上亘古未有的先例，中国近代的苦难历史从此揭开了第一页。此后，所有国际强盗一齐涌来，把我们打翻在地，再踏上几只脚，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西方列强一方面挟带来先进的生产力，发达的科学技术，另一方面在中国大肆屠杀，显示出原始积累时野蛮残酷掠夺的特征。这给中国先进分子造成了憎恶与钦佩交织的困惑心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背负着被侵略的屈辱与愤怒，踏上了向西方学习，实现国家独立与近代化的艰难历程。

一、开眼看世界

在鸦片战争中，堂堂的中华大国、天朝的“天兵天将”，竟被一个以前视为西方的“夷狄小国”打败，这种失败和随之签订的卖国条约，使中华民族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动荡和追索之中。在时代剧变的强烈震撼和西方文化冲击的双重冲突面前，中国封建士大夫中的一部分人，从昏睡的状态中惊醒过来，地主阶级中关心国家命运和“世情民隐”的有识之士，不能不睁开眼睛看看世界，议论国事，发出外抗强敌，内求变革的呼声，这反映了中国几千年来士人的最初的觉醒。林则徐、魏源就是这种觉醒的佼佼

者。

林则徐（1785—1850年），字元抚，号少穆，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1811年中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盐运使、按察使、江苏巡抚、湖广总督等职。在任职期间，他清理冤狱，救灾代赈，兴修水利，整刷吏治，办事严肃认真，受到人民的拥护，被称颂为“林青天”。从“民惟邦本”的思想出发，他主张“知名情向背而顺导”，一再表示要“府顺舆情”、“为民请命”。他关心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考察民心，爱惜民力，主张在灾区减征缓征钱粮糟米。他的这种体察民情、爱惜民力的主张在广东禁烟和反侵略斗争中发展为“民心可用”的思想。

禁烟运动和鸦片战争的实践，使林则徐的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他突破了传统的地主阶级改革派政治家的界限，具有了近代眼光。他敏锐地意识到西方列强与传统观念中的“蛮夷”不同，“夷性无厌，得一步，又进一步，若使威不能克，即恐患无已时，势必它国纷纷效尤，不可不虑”^①。他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有了一定的认识，并积极地进行反侵略的斗争。站在爱国主义立场上，林则徐提出了“民心可用”的进步主张，组织人民群众齐心协力踊跃参战，发出告示：“群相集议，购置武器，聚合丁壮，以便自卫”^②。他操练水师，招募水勇，以备随时调遣。这是林则徐在广州能有效地进行抗英斗争的一个重要条件。

为了“知己知彼”，林则徐克服了夜郎自大的心理，承认西方列强的长处，并虚心学习。他广泛搜集广州和澳门外国人出版的各种书报，包括传教的小册子，了解外国情况，尤重军事、商业、科技、法律方面的知识和情报，还组织人翻译英国学者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译名为《四洲志》），将《澳门新闻稿》译为《澳门月报》，又摘译《中国人》，《在中国做贸易罪过论》

①《林文忠公政书·两广奏稿》卷四。

②《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271页。

等书，以及大炮瞄准法、战船图事等资料，这些是近代中国系统介绍西方各国地理历史知识的最初书籍。在实践中，林则徐认识到闭关锁国政策的危害，坚决反对“概断各国贸易”的政策，其识见和策略远远高出了同代人，因此他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了解西方、认识西方的先驱。

林则徐雄才大略，然而却横遭猜忌、排斥和打击，一生坎坷。鸦片战争中，他功勋卓著，但由于受到投降派的诬陷，被滴职新疆。1841年8月，林则徐赴新疆时，正值鸦片战争处于最危机的阶段，英军猖狂进攻，清军节节败退。林则徐闻讯忧心如焚，写下了许多感人的诗篇。他在留别家人的一首诗中写道：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句诗生动地表达了林则徐不顾个人安危，忘我牺牲的坚强意志，也是他一生坚贞爱国高尚品格的真实写照。林则徐到新疆后，兴修水利，修坎井，当地人民称他为“林公井”。他还视察了库车、阿克苏、乌什等地，对沙俄的侵略有所觉察，“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①要求朝廷充实西北防务，防御沙俄侵略。由于封建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束缚，这位民族英雄未能在近代史上大展宏图，便了遂平生志愿。

魏源（1794—1857年）是近代中国睁开眼看世界的又一位先驱者。他出生于湖南邵阳一个小官僚地主家庭，28岁中举，专攻今文经学，“以经述为治术”，主张“贯经书、政治、文章于一”，在学术上提倡经世致用，反对逃避现实、埋头考据的学风。鸦片战争期间，直接参加筹划浙江前线的抗英斗争。鸦片战争失败后，他愤而著《圣武记》，阐述清王朝兴盛时期的武功，以与当时军事上的颓势相对照。并在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基础上，大量增补，扩充资料，编成《海国图志》50

^①《林文忠公政书·两广奏稿》卷一。